

一生鈞運、普及教育的苦行僧

林孝信訪談*



時間

2015年3月24日週二

兒時成長與佛教

林孝信(以下簡稱「林孝信」)開台北了。那時是戰後，媽媽講，當時大家要遷徙，目標很大的大鎮，於是到了彰化山是什麼地方，直到他辦了彰化二林社區大學。他到二林的時候是在芳苑度過的。我出生後先住到媽媽家，後來一小段時間在台北住過。他是一個程度蠻高的，從台北到二林的因素而被歧視，他是一個方面的專長。父親一提出調職一來因為我，他娘家都要一大清早出

我1950年進中山

* 本文是科技部研究計畫(101-2311-B-001-H-009-033-MY3)成果之一。
訪談者：陳光興、林麗雲、蘇淑芬、陳素香
本文於林孝信過世後，由陳光興、林麗雲、蘇淑芬、陳素香共同編註：根據維基百科，林孝信於1950年3月4日為沙山鄉，屬台灣省彰化縣。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林孝信>
3月4日。

兒時成長與佛教經驗

林孝信(以下簡稱「林」)|我1944年出生在台北，出生後一個禮拜左右就離開台北了。那時是戰爭末期，美軍已經開始轟炸，但沒有要主攻台灣。聽我媽媽講，當時大家要疏散到鄉下去。我媽媽是鹿港人，可是鹿港還是一個目標很大的大鎮，於是我們就到了鹿港南邊的沙山。我問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沙山是什麼地方，直到十年前辦社區大學的時候以串聯的精神到處跑，遇到創辦了彰化二林社區大學的謝四海，他告訴我沙山就是現在的芳苑ⁱ。聽說我滿月的時候是在芳苑度過的，因為媽媽產後不久就被疏散，所以我們應該是在我出生後先住到媽媽鹿港的娘家。六歲以前我的記憶比較模糊，只記得有一小段時間在台北住過，六歲左右就搬到宜蘭了。我爸爸在日據時代算受教育程度蠻高的，從台北工專(現台北科技大學)畢業。但因為台灣內部省籍對立的因素而被歧視，他只能在宜蘭的電力公司做業務，甚至也不能發揮他工程方面的專長。父親一直在那裡做到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終於調到了彰化。提出調職一來因為我媽媽抱怨父親的上司對他很不好；二來媽媽每次回鹿港娘家都要一大清早出發，晚上七、八點才能到達，很辛苦。

我1950年進中山國小，學校在宜蘭市中心的宜蘭公園附近，是那時極少

* 本文是科技部研究計畫：【台灣左翼思想口述計畫(1970年代至1980年代)】(NSC 103-2410-H-009-033-MY3)成果的一部分。主訪人：陳光興、林麗雲；訪談參與人：陳光興、林麗雲、蘇淑芬、陳素香、陳瑞樺、陳瑩恩、劉雅芳；影像記錄：陳素香；攝影：蘇淑芬。

本文於林孝信過世後由其家屬授權刊載，刊載前由陳光興、鄭鴻生與劉沅三位進行校對。

i 編註：根據維基百科「芳苑鄉」條，「於1920年……當時為台中州沙山庄，戰後1946年1月時為沙山鄉，屬台中縣北斗區，境內有二十六村。同年二月更名為芳苑鄉……」參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B3%E8%8B%91%E9%84%89>，擷取日期2016年3月4日。

數的男女混校。其實我進大學以前相當單純，是個「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標準乖學生，書也讀得不錯。我從小就對科學和數學很有興趣，五、六年級之前數學從來不用複習，成績就能考到非常好。1956年我在宜蘭縣聯考考了第一名，考取宜蘭中學。其實很多人都跌破眼鏡，因為我小學在愛班，前三班的第一名都比我好，而且我會考考得也不好。我想有一個因素是那一年國語作文的題目是「我的母親」，我現在還有點印象我寫了一個頗有創意的作文。

我有位念同個國小、同個國中的好朋友叫李宗德，是他帶我去學佛。我小時候有一陣信佛教很虔誠，還打算要出家，當時法名叫慈文。那時星雲法師是我的皈依長，我算是他的第一代弟子，如果我出家留在佛光山體系的話，地位應該非常高。我小學時候在李宗德建議下開始參與兒童班，那是星雲法師在宜蘭北邊雷音寺的念佛會之下的兒童班。我爸爸有傳統的文人味道，喜歡喝酒、下棋、寫詩和種花，禮拜六我會摘家裡的花拿去寺院供奉。有一次星雲法師想要找小朋友去弘法，那是我第一次上台演講，講佛教的東西。一直到初中我還是非常熱誠的，後來參與的一些活動其實也跟這個有關。到了初中的年紀，兒童班就變成學生會、青年會，成員大概有一百人。我當時對佛教非常熱誠，很想把這個會做好，所以常常去訪問會友，也拉攏一些有慧根的同學。讀了一些高僧的傳記後，我覺得如果要弘法的話要去關心群眾——現在左派的說法也是這樣。宜蘭經常有風災，風災之後我會騎腳踏車去會友家裡訪問。有一個小學同學叫許阿松ⁱⁱ，住在農村，我一直想要拉攏他。有一次我去他家看到他家房子整個被吹掉，因為蚊子很多，房子裡弄了一個蚊帳。我問那下雨怎麼辦，他說那也沒辦法，就是看著星星睡覺——這一幕給我印象很深。

李宗德的父親是醫生，初二時家裡搬到台北市，他考試插班到建中。這件事給我一些刺激，之前覺得我們鄉下的孩子跟城裡的沒法比，如果過去考

ii 編註：羅東鎮民代表會有位許阿松先生曾經在1986至1989年和1998至2001年當過兩任鎮民代表，是否為老林的同學待查證。

建中一定是名落
心。初二時有個
容易進好的大學
年考高中時就參
可以直升，不用

高中時我跟
教。至於我的緯
去美國找我時我
高中時我也同時
物老師楊育賢教
裡面有個回答別
士」。高中時候
讓我有點困惑，
不能殺動物，而
喝一杯水就在殺
苦惱的是，如果
呢？我帶著這個
系列佛學書的管
此前我都是把佛
佛教是一個因為
輪迴、苦的觀念
牟尼去神聖化了
生物中有草履蟲
把它當成某種東

台大自覺運動

林 | 1962年我以

建中一定是名落孫山。而且李宗德成績不比我好，於是我就有了考過去的信心。初二時有個老師也私下跟我們這些成績好的小孩講，去台北考的話比較容易進好的大學，但是要先將戶口調過去。之後我就把戶口遷到台北，1959年考高中時就參加台北的聯考，以第二名考進建中。而且那個第一名本來是可以直升，不用考的，但因為初二時當槍手被記了大過，才又參加聯考。

高中時我跟李宗德是隔壁班，我們在學校裡也很熱誠地招兵買馬和傳教。至於我的綽號「和尚」是後來王曉波叫的，他大概知道我以前信佛教；他去美國找我時我剛結婚，他回來後在《夏潮》寫了篇文章叫〈和尚結婚了〉。高中時我也同時對科學很有興趣，而且除了數學、物理、化學外，高一的生物老師楊育賢教得很好。我們學生時期有個很有名的學生刊物《學友雜誌》，裡面有個回答別人科學問題的專欄叫「萬能博士」，楊老師就是那位「萬能博士」。高中時候我知道了在動物和植物之間還有一種生物，比如草履蟲。這讓我有點困惑，因為我很相信佛教說的不能殺生，但是這才明白佛教指的是不能殺動物，而不是所有生物，如果不能殺植物的話就餓死了。但其實我們喝一杯水就在殺生了，因為裡面有很多微生物，這讓我很苦惱了一陣子。更苦惱的是，如果說吃素可以吃植物，那些介於動物與植物之間的生物怎麼辦呢？我帶著這個困惑一直到了大學。在台大圖書館參考室遇到了一個寫了一系列佛學書的管理員，比如原始佛教是怎麼形成的。這對我很有影響，因為此前我都是把佛教絕對化，覺得釋迦牟尼是聖人才能講出最高的真理，好像佛教是一個因為釋迦牟尼而從無到有的過程。看到這些文章才知道那些關於輪迴、苦的觀念，其實在原先的印度已經存在一些了，這樣我就漸漸把釋迦牟尼去神聖化了，對以前的教條也有了新的眼光。再說，釋迦牟尼也不知道生物中有草履蟲這種生物。那是兩、三千年前的觀念，一定有它的侷限，要把它當成某種東西來崇拜是有點可笑的。於是我就這樣漸漸離開了宗教。

台大自覺運動與《中學生科學週刊》

林 | 1962年我以建中第七名保送進台大化學系，因為我前面兩個人都進了物

理系，所以我沒法以第一志願進物理系。爸爸知道我可以保送後很高興，特意請假跑到台北來勸我讀醫，可是我沒有興趣。妥協的結果是：第一志願物理系，第二志願醫科，第三志願化學系。可是台大醫科很屌，怎麼可能接受第二志願的人進來呢。於是我就進了化學系，我的學號是512301——「51」是民國51年，「23」是化學系，「01」是化學系保送第一名。大二我才終於轉到物理系。

我從小就對科學很有興趣，可是除了《學友雜誌》外找不到一本科普書籍。中山國小沒有圖書館，附近的縣立圖書館裡也沒有。我找書找得非常挫折。建中的校風比較自由，我一有空就去對面的中央圖書館，找到了幾本科學類的書。主要拼命在看的有兩套書，一是《中華文化基本叢書》，其中也有一些翻譯的書，讓我如獲至寶的是《數學的趣味》和羅素寫的一本關於數學哲學的書。另一套是《大學叢書》，是商務印書館在大陸時出版的，其中有一些科學的書。進了大學開始看英文書，更覺得如獲至寶，因為之前找書的挫折感讓我想到了可以把這些書翻譯成中文，讓其他找書的人也能看到。於是大一時我找了化學系、物理系的幾個人每禮拜聚在一起，我帶頭翻譯了一本關於數學集合論的書。但是那時對出版沒有概念，翻譯之後找不到出版社，於是這本書就從沒被出版。大二到了物理系，找到一個同是建中畢業的同學胡卜凱——胡秋原先生的兒子。胡秋原跟我們講出書或出雜誌都要錢，不過現在《新生報》有個週刊可以交給我們編。我們就去那邊編週刊，不用自己出錢，也沒有拿編輯費。我們給它取名字叫做《中學生科學週刊》，因為覺得我們自己只有大學一、二年級的程度，還沒辦法為大學程度以上的人出週刊。這也是《科學月刊》的前身。

另外一個重要事件是「自覺運動」。當時一個在台灣學了好幾年中文的美國人，在離開台灣前以「狄仁華」為名寫了一篇文章投到《中央日報》副刊，作為臨別時對台灣的觀感。這篇〈人情味與公德心〉講到他這些年來覺得台灣是很有人情味的地方，但缺少公德心。比如，等公車時候沒有人排隊，或者本來有人排隊，公車來了之後就一擁而上，排隊的人就白排了。這篇文章刺痛了台灣有些人的自尊心，覺得被外國人數落了一番。之後台大的陳鎮國就

上台講「我們不要搞出了自覺運動」。

因為當時很多後有了些曲折。劉需的才能——下筆團想要培養一些有高二時是《建中青年》也還不錯。台大代參與競逐。如果以已，可是體制內的生就覺得這才是他物《新希望》（他的）他寫的。這份刊物了幾千份。台大和是要想辦法疏導一很感動、熱血沸騰點少了，第四期就會看膩；鼓動之後樣的瓶頸。

大一時我住在舍。跟我同寢室的學雜誌》的創辦人念醫。所以他大四書，可是女朋友在月就分手了。他受台到台大心理系（可能多，人情世故都懂趣，跟楊國樞來往

上台講「我們不要這樣啦」、「我們要自覺」之類的話，之後也在他的提倡之下搞出了自覺運動。

因為當時很多人出來響應，但在戒嚴的狀況下救國團很快設法介入，之後有了些曲折。劉容生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學，高中時他就展現出各種領導所需的才能——下筆能寫，也有演講能力，被選為班長。高二或高三時，救國團想要培養一些有潛力的同學，劉容生是學校挑選出的兩、三個人之一。他高二時是《建中青年》的總編輯，高三是我們畢業紀念冊的總編輯，書讀得也還不錯。台大代聯會選舉類似的事情劉容生高中時都玩過了，所以沒有去參與競逐。如果以他的聲望和跟救國團的關係來參選的話，只是探囊取物而已，可是體制內的東西對他而言都覺得是「家家酒」了。自覺運動出來時劉容生就覺得這才是他發揮抱負和能力的地方，馬上自掏腰包辦了一份報紙型刊物《新希望》（他的父親劉行之是監察委員，所以家境還可以），文章基本都是他寫的。這份刊物在某個觀點下是地下刊物，但是可以公開取閱的，一期出了幾千份。台大和國民黨對這個轟轟烈烈的自覺運動也不好直接取締，但還是要想辦法疏導一番。劉容生特別擅長寫這種慷慨激昂的文章，很多人讀了很感動、熱血沸騰。《新希望》的第一、二期都是掌聲不少，第三期的掌聲有點少了，第四期就有點強弩之末的味道了。這種慷慨激昂的東西久了，人家會看膩；鼓動之後沒有實質的東西，人家也疲乏了。劉容生當時就碰到了這樣的瓶頸。

大一時我住在山腳下的第七宿舍，大二時住在校園裡的理學院第六宿舍。跟我同寢室的一個心理系的學生，跟我同屆，但大我四歲——就是《大學雜誌》的創辦人鄧維楨。大一念文學期間，他追一個女孩子，對方希望他念醫。所以他大四時重考到高雄醫學院，放棄了文學學士。他跑到南部去念書，可是女朋友在台北，那時又沒有電腦，這個愛情故事的結果就是沒幾個月就分手了。他受了很大創傷，本來念醫就是為了女朋友，所以又休學重考到台大心理系（可能因為內心受到創傷吧）。因為這些曲折，他比我們成熟很多，人情世故都懂，而我們那時還是毛頭小子。鄧維楨對羅素思想比較有興趣，跟楊國樞來往很多，對西方思想的接觸也比較廣。楊國樞是台大心理系

助教，在之前的《文星》雜誌寫過一些文章，當時也搞了一個讀書會讀英文書《科學哲學讀本》(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因為英文書很貴，大家會找翻版書社做翻版，可是要承諾賣出多少本才有書商願意做。所以鄧維楨在宿舍裡就跟我講這本書裡有很多跟物理有關的東西，想要勸我買。當然為了同寢室的立場我也要買，買書後也跟著去參加楊國樞組織的讀書會。之後我介紹劉容生給鄧維楨認識，鄧維楨建議他《新希望》要辦下去就得搞一些思想性的、啟蒙的文章。

劉容生被鄧維楨說服了，把《新希望》從報紙型改成雜誌型，並聘鄧維楨當總編輯。改版後的第四期登了兩篇羅素的翻譯，後來一共出到第七期。雜誌有一些影響力，也集結了一些人，因為那時是台灣社會很沉悶的時期，連文化性的《文星》也已經停刊了。雖然我對這些沒什麼感覺，因為對科學比較有興趣，但很多人感覺到苦悶——關心的議題不能講，有很多禁忌。我跟劉容生從高中時就很要好，因為我在《建中青年》寫過一兩篇文章，做畢業紀念冊時也是他的助手。《新希望》起初已經聚集了一些人到他身邊，比如台大的黃碧端、馬以南(馬英九的姐姐)，甚至校外來的人也有，比如師大的王拓、文化大學的高信疆。劉容生也會辦一些座談會，會拉我去湊人頭。那時他或許有一些打算，但我沒有那麼多政治敏感度。比如，大一時他會找一些人去陽明山郊遊，郊遊時就談論一些國家大事。到第七期時雜誌被停刊了，歷時很短。停刊理由是因為兩篇羅素的文章。那之前不久發生的一件大事是蘇聯試爆了一顆超級氫彈，全世界很震撼，因為蘇聯在美國之前做出來了。有個記者去訪談當時非常有聲望的羅素，問他，「蘇聯如此敲詐，如果對立到引發戰爭，會不會人類社會就被毀滅了？還是西方世界應該選擇投降？」羅素當然回答說要投降了，這樣未來人類還有希望，如果硬碰到底就什麼都沒了。台灣報紙說羅素是「附匪」、「寧降不死」，於是羅素就被反共的台灣封殺了。台大當然逮到這樣一個契機把《新希望》停刊了，因為《新希望》本來就被視為不聽話的小孩。雖然雜誌出不成了，劉容生還是找這些集結起來的二、三十人每學期聚會一次。

我在《新希望》只是啦啦隊的角色，我自己在忙的是編《中學生科學週刊》

和台大物理系系
到了大四快畢業
「求真社」以維持
運動裡面認識了
大理學院、工學
前大家聚會提到
個循環信的聯絡
信給五、六十人
的消息。我寫一
第二站，這樣一
了好幾個循環，
以讓很多人保持

《科學月刊》

陳光興(以下簡
脈為基礎嗎？

林 | 是以這個循
各處跑。這種論
能在辦公室當老
芝加哥圖書館裡
我覺得特別精彩
時候讀不懂英文
到台灣還相對貧
速公路。在想怎
來說就是台灣的
來跟很多人接觸

和台大物理系系刊《時空》雜誌。《時空》中間斷過幾年，不過現在還在出。到了大四快畢業時，大家要找《中學生科學週刊》的接班人，便在台大成立了「求真社」以維持雜誌，一陣子之後也停掉了。我在《中學生科學週刊》和自覺運動裡面認識了一大票人。《中學生科學週刊》聯絡了五、六十個人，除了台大理學院、工學院的，還有師大的。我們有了這樣一個廣泛的朋友圈，出國前大家聚會提到出國後要維持聯絡，不要散掉了。於是他們要我負責建立一個循環信的聯絡。在沒有電腦的時代，維持聯繫很困難，我一個人不可能寫信給五、六十人。所以就以一個循環信的方式，讓每一個人可以獲得更多人的消息。我寫一段話或我的近況成為第一站，下一個人再加上寫一段話成為第二站，這樣一一傳下去成為一個循環。為了讓一個循環不會太久，我們弄了好幾個循環，七、八個人一個循環，過一陣子再大風吹重組。那是一個可以讓很多人保持聯絡的有效率的方式。

《科學月刊》

陳光興(以下簡稱「陳」)| 接下來搞《科學月刊》還是以這個循環信裡面的人脈為基礎嗎？

林| 是以這個循環信做基礎，但聯絡面更廣。要辦《科學月刊》時，我開始到各處跑。這種搞串聯的動機和能力是從學佛時候開始的——要關心群眾，不能在辦公室當老爺，所以我到現在還是這樣。我到美國後發現了更多東西。芝加哥圖書館裡有很多的科學書，尤其是很多大師會出一些演講的小冊子，我覺得特別精彩。我想要把這些介紹到台灣，覺得在台灣還是井底之蛙，小時候讀不懂英文時就是井中之井了。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心理是，在美國感受到台灣還相對貧困，物質建設跟美國相比還差一截，比如沒有高樓大廈、高速公路。在想怎樣讓台灣早一點富裕起來，跟美國看齊，這對我們念科學的來說就是台灣的科學有待提倡。從科學的層次來講，辦《中學生科學週刊》以來跟很多人接觸，覺得台灣社會迷信的東西還是很嚴重。科學之外，一到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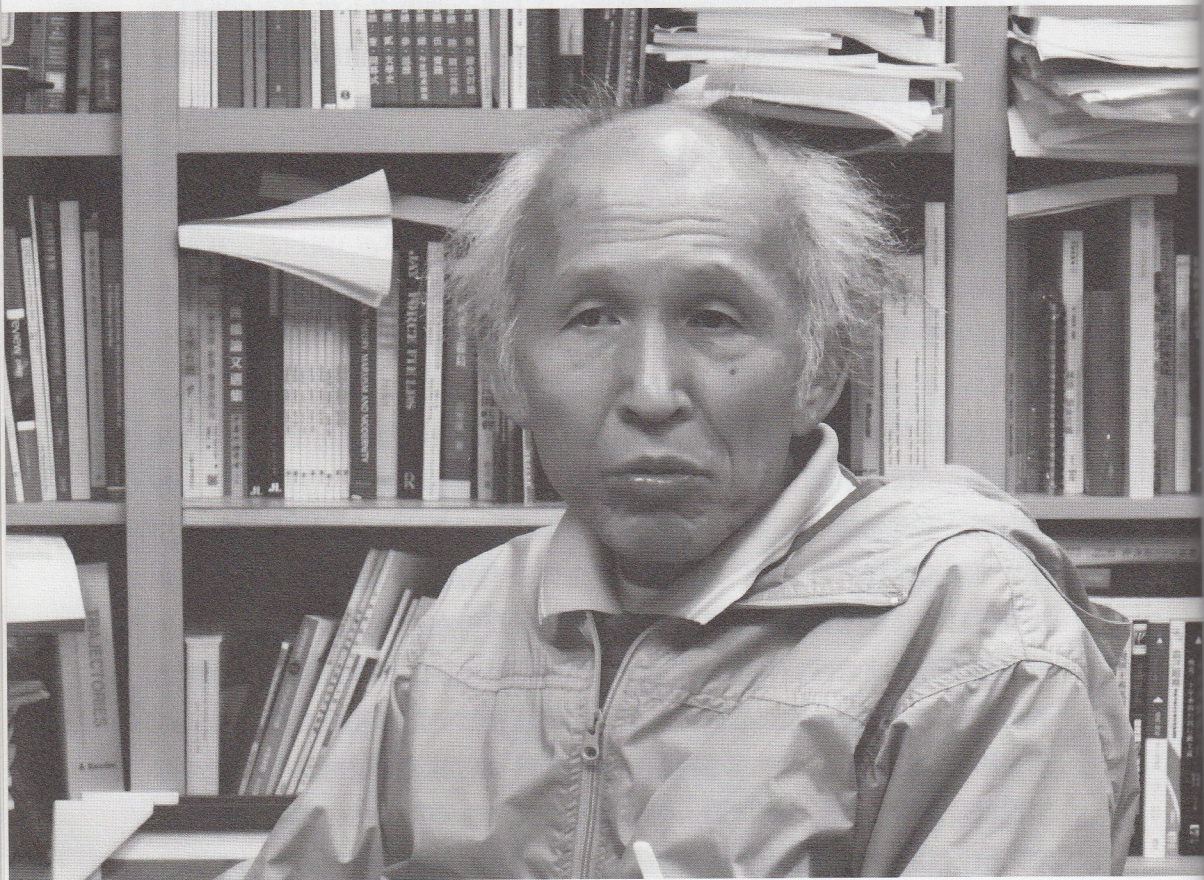
國就覺得社會的氣氛跟台灣很不一樣，在美國所有人都在罵國民黨，罵得很刻薄，讓我有點震撼。那時我在政治上還沒有開竅，還是覺得光把台灣罵得一文不值沒用，要設法去做。可是海外很多人只是罵，罵到最後的結果就是不能回台灣了。可是這些人才不回台灣，台灣的格局打不開，便還是井底之蛙，只是延續了被他們罵的那種狀態。六〇年代校園學生運動對我的衝擊，只是讓我看到美國學生一天到晚上街頭遊行，但那時我政治上還沒有開竅，所以並沒有受到思想上的影響。

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心理背景，我們大學時期那一屆物理系是學生程度

最好的，卻是有史
很困惑為什麼台大
台灣的物理系師資
有聯絡人家，如果
也是在台大辦《時
原因，可是我年輕
情。這樣大家也許
慮救亡圖存的意思
一起做些沒有爭議
還是不好，或是討

我1966年從台
考，只剩下論文了
了一大批人，也有
1968年10月到11月
創刊。因為這個刊
是為台灣的科學事
我做了一年多總編
了。為了刊物的需
學月刊工作通報》
二、三百份，建立
《科學月刊》創
期，雜誌在台灣出
為創刊經費。那時

iii 編註：在影印普
的「鋼筆」在塗上
上，沾上油墨把
出來的圖文字跡
以應用相當普遍。



最好的，卻是有史以來師資最差的，都是靠學生自己組讀書會。我那時起就很困惑為什麼台大物理系的畢業生出國之後很少回來，如果他們肯回來的話台灣的物理系師資就可以提高了。我想可能是因為畢業生出去之後，我們沒有聯絡人家，如果我們一直讓大家了解台大物理系的狀況，就會好一些。這也是在大辦《時空》雜誌的原因。到美國後才知道了他們不回來還有政治的原因，可是我年輕沒有太多政治感覺，只是覺得大家應該一起為台灣做些事情。這樣大家也許會對台灣有更多感情，就更願意回台灣。倒也不是特別考慮救亡圖存的意思，主要是想改變台灣的貧窮。總之，就是很天真地想大家一起做些沒有爭議的事情——教育、科學普及，也就是先不要討論國民黨好還是不好，或是討論那時已經出現的台獨爭議。

我1966年從台大畢業，當了一年預官就出國了。一年多後過了博士資格考，只剩下論文了。那時有了空閒，想要多讀一點東西，循環信之中也聯絡了一大批人，也有編《中學生科學週刊》的幾年經驗。考慮到上面這些因素，1968年10月到11月左右我就開始籌備《科學月刊》，1970年1月在台北正式創刊。因為這個刊物是要為台灣做的，開宗明義不是為個人事業或賺錢，一是為台灣的科學事業，二是做一個橋樑讓海外留學生能夠關心台灣與合作。我做了一年多總編輯，組稿、規畫內容、找人、捐錢，可是已經超過負荷了。為了刊物的需要，循環信就顯得慢了點，於是我決定發行一個通訊《科學月刊工作通報》。前兩期是刻鋼版ⁱⁱⁱ的，第三期開始拿影印機影印，發到二、三百份，建立了一個有效率的聯絡網。

《科學月刊》創刊後的一年保釣運動就爆發了，那時通訊每個禮拜出一期，雜誌在台灣出版。一開始我們也沒有想得很仔細，收到一些捐款，就作為創刊經費。那時我碰到了清華大學的李怡嚴。1968到1969年間在芝加哥大

iii 編註：在影印普遍化之前，刻鋼板是一種平民化的複印方法。其法用特製的有鋼製尖端的「鋼筆」在塗上蠟的「蠟紙」上寫字和畫圖，然後把刻有圖文的蠟紙捲到「油印機」的滾筒上，沾上油墨把圖文印在白紙上。油墨透過蠟紙上被「鋼筆」刮掉蠟的部分就顯示出「刻」出來的圖文字跡。油印機和鋼筆、蠟紙等一般學校、辦公室或小型雜誌都可以負擔，所以應用相當普遍。

學認識他後，他馬上非常熱誠、積極地投入。於是我請他做台灣的負責人，可是考慮到他可能沒有在台灣辦刊物的經驗，後來打聽到楊國樞在伊利諾念博士，1969年7月拿到博士學位後將要回台灣。並且我大學時候就認識他，也知道他有辦刊物的經驗。於是我們飛過去找他，請他回台灣後和李怡嚴一起做台灣的負責人。李怡嚴非常熱心，他的薪水和辦公室都貢獻出來，楊國樞也投了很多他那邊的資源進來。另一個重要參與人是我在國際學舍的室友曹亮吉。

那時候參與這份工作的人已經有幾百位了，這個情形逐漸被大家傳到台灣去了，後來台灣也給予配合，刊物出來前台灣的媒體還刊登了很多報導。我在籌辦刊物時，林懷民正在密蘇里的新聞學院念書，那期間他經常跑到芝加哥看舞蹈演出，我們在那時認識了。他看到我們在籌辦《科學月刊》就主動跑來幫我們的通訊貼名條、貼郵票。他也很會搖筆桿，寫了一篇文章到《中央日報》。（林懷民也參與了後來的保釣運動。）所以創刊前，《科學月刊》在台灣社會已經有點轟動了。我還提議在各地設立聯絡員來推銷刊物，於是台灣很多學校都在聯絡員的基礎之上成立了科學社，也就是說那時候圍繞著《科學月刊》儼然形成了一個蠻先進的社群和網絡。第一期的第一版和第二版剛出來就賣光了，訂戶也有一萬多，這在台灣雜誌歷史上是很少見的，那麼辦刊物的經費也不成問題了。第一年比較順利，可是第二年保釣運動就來了。

保釣運動

陳 | 之後你介入了保釣運動，在運動過程裡面當然是很匆忙的，那麼現在回頭來看運動對你個人的撞擊是什麼呢？

林 | 我本來對政治沒有什麼興趣。還是先談一下保釣運動的幾個重要事件。1971年1月第一次示威遊行，台灣政府慌了，馬上派人來疏導。疏導的代表是（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的處長姚舜，但他鐵羽而歸。3月間，海外五百位華裔學者聯名上書給蔣總統要求政府出面保釣，我們就更有底氣了。所以國民

黨當時的做法我們也
也沒有要反政府。日
據教科書裡面寫的
的主要氣氛是對國
那一年的9月它在聯
「你們做的是對的。
只有美國和日本跟
準備和中國和解了
士在這邊反對日本
我們同情政府的困
呢？如果明年日本
我們不能認同忍氣

參加4月進行的
保釣。無力是它根
不想保釣。正在這
是在那個時候剛好
必然和偶然的結合
促政府去做。可是
進行了。如果我們
政府一定會臉上更
釣，所以沒有想要

那該怎麼保釣
政府好像還蠻強大
到哪一個美國議員
言論都被當成頭等
家吃晚飯時，美國
台這麼做——尼克
我跟周恩來的共同

黨當時的做法我們都不理，不去想有什麼後果，覺得我們完全沒有做錯事，也沒有要反政府。日本人已經來欺負我們的漁民了，我們是要愛國，只是根據教科書裡面寫的愛國主張實踐一下而已。接下來是4月10日的大遊行，它的主要氣氛是對國民黨政府的絕望。因為當時國民黨的外交局勢非常困難，那一年的9月它在聯合國的席次也丟了。那時候姚舜來疏導我們時候也說：「你們做的是對的，只是我們政府現在處境很困難。目前世界上比較大的國家只有美國和日本跟我們還有邦交，可是美國也不穩了。」那時美國確實已經準備和中國和解了，所以他們覺得真的會支持台灣的只剩下日本了。保釣人士在這邊反對日本不是跟政府唱反調嗎？而我們並不是故意要跟政府為難，我們同情政府的困難甚至感同身受，但是不是因此就要把釣魚台主權讓出去呢？如果明年日本又來要澎湖列島，是不是也給它？那後年又要給什麼呢？我們不能認同忍氣吞聲，所以跟國民黨的人講不通。

參加4月遊行的人都覺得國民黨根本不會保釣——既無力保釣，又無心保釣。無力是它根本不是日本的對手，無心是它為了聯合國席次等考量根本不想保釣。正在這個困惑的關頭尼克森宣布了要去大陸訪問的消息，如果不是在那個時候剛好發生，保釣運動會往哪裡走還不清楚。所以歷史就是這樣必然和偶然的結合。我們很困惑，覺得學生手無寸鐵，只能通過示威遊行敦促政府去做。可是現在知道政府根本不會做，所以那之後就沒有第三次示威遊行了。如果我們要像太陽花學運一樣給政府難堪，一定會辦第三次遊行，政府一定會臉上更無光。可是我們不是為了跟政府過不去，而是真心為了保釣，所以沒有想要辦第三次遊行。

那該怎麼保釣呢？我們忽然發現還有另一個中國政府的存在，這個中國政府好像還蠻強大的，連美國總統都要親自登門訪問。以前我們台灣媒體聽到哪一個美國議員來台灣都覺得很光榮，甚至他們發表了什麼對台灣有利的言論都被當成頭等大事，至於總統來訪則想都不敢想。7月15日晚上六點大家吃晚飯時，美國所有電台、電視台聯合插播——總統有權力讓電台、電視台這麼做——尼克森宣布：「我已經秘密派季辛吉去會見了周恩來，以下是我跟周恩來的共同聲明。當周恩來聽到美國總統有意來訪，代表中國歡迎美

國總統明年適當的時候來訪問。」之後尼克森以一種很得意的神情說：「我很愉快接受這個邀請」。這在我們留學生看來很不是滋味，一方面在想台灣該怎麼辦，有一種悲從中來；另一方面美國總統竟然很榮幸去中國，好像有一種與有榮焉的感覺。這個心理狀態很複雜，如果要拍保釣電影，這一段是很好的題材，卻又很難捕捉。

陳 | 你講後來保釣的轉向其實是尼克森帶來的，如果沒有這件事，留學生的眼睛可能不會往中國看。尼克森的事情出來前，保釣內部的差異出來了嗎？《戰報》這些左傾的人的眼睛也不在中國大陸嗎？

林 | 差異還沒有出來。左傾的是很少數人，他們寫的東西戰鬥力很強，但我們還沒感覺到所謂左翼。我們在4月遊行之後碰到幾個大問題：一是為什麼國民黨不願意保釣；二是為什麼日本又來欺負我們；三是為什麼美國偏袒日本。雖然國民黨說是因為外交，但似乎又不止外交理由。在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中，雖然日本曾經欺負過我們，可是經過二戰的失敗已經痛改前非了，特別是在蔣公以德報怨的心態下。另外我們在台灣受到的教育都說美國是主持正義的國家，把美國的形象塑造得非常正面，不像現在連美國自己都在批評自己的漏洞。4月之後我們為了解開這三大疑問開始了探索的階段，這些疑問主要是跟近代史有關，於是大部分保釣積極分子就開始進入中國近代史。美國圖書館都有很多近代史的資料，之前根本不會去看，現在才有了動機去看，甚至很多保釣刊物改成了《國是通訊》等名字。讀到5月初碰到了五四運動的日期，大家也有一點心得了，又覺得保釣運動跟五四運動有一點關係——都是抗日，都是政府打壓抗日的人。那一年的5月1日剛好是週末，於是很多地方開始辦五四運動座談會，紀念五四運動，從回顧五四來了解保釣運動為什麼會發展成這樣。這是探索的階段，以上那些疑問基本上從近代史上澄清了。但澄清之後還是徬徨，了解之後覺得保釣更沒有希望。

這種時候尼克森宣布訪問中國，讓很多人看到中國的實力是可以保釣的，就有了希望想要了解中國近代史。從台灣出去的人，除了極少數之外，

一開始對大陸都不了解，而且連美國人形容為狡猾、會搞陰謀的人。大家美國人也會問為什麼不能再把中國形勢就掀起了「中國」很多其他地方都有對之上，而如今這國。另一個讓很多然都覺得這裡面很之中的很多弊病是是對世界上有左翼很有理想主義色彩這之前有左傾思想（四一〇遊行的總的幾千個人是沒有

保釣運動的左轉

陳 | 於是保釣的主華到安鄉堡只有國際局勢？

林 | 安鄉堡會議是決裂。有些動作了。除了國際局勢前已經發生了，所

一開始對大陸都不了解，完全按照反共八股去認識。那時候開始覺得應該去了解，而且連美國人也開始想要了解中國。冷戰期間，美國的媒體也把中國人形容為狡猾、貪婪等種種惡劣品格的綜合體，電影中的形象也是獐頭鼠目搞陰謀的人。大家都被這種宣傳洗腦了。可如今發現連總統都想要去中國，美國人也會問為什麼，也意識到之前對中國的認識有偏差。對美國政府來說也不能再把中國形容得那麼壞，必須要調整對於中國的敘述了。於是美國社會就掀起了「中國熱」的情形，而且尼克森宣布訪華對美國、台灣、日本以及很多其他地方都有衝擊。因為當時的國際局勢是建立在美國和中共的絕對敵對之上，而如今這一國際局勢似乎就要瓦解了，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想了解中國。另一個讓很多人對中國產生興趣的是當時中國開始文化大革命，我們雖然都覺得這裡面很有問題，但還是承認其中的理想主義色彩仍然很高。文革之中的很多弊病是我們後來才知道的，但當時文革中反帝、反資的說法還是對世界上有左翼傾向的人很有影響。因為中國當時還是提倡社會主義，很有理想主義色彩。所以在上述因素作用下，保釣的很多人開始左轉。在這之前有左傾思想的人應該不會超過二十人，比如劉大任、郭松棻、李我焱（四一〇遊行的總指揮）。只有這少數這幾個人對中國有點認識，但參與遊行的幾千個人是沒有認識的。

保釣運動的左轉與海外左派狀況

陳 | 於是保釣的主流開始左轉，到了9月有了安娜堡會議。從尼克森宣布訪華到安娜堡只有兩個月不到的時間，能夠造成這麼快的轉向，是因為大的國際局勢？

林 | 安娜堡會議是左轉的結果，那時保釣主流已經左轉了，而會議的結果是決裂。有些動作比較快的，7月就開始讀《毛澤東選集》等中國大陸的東西了。除了國際局勢的影響，還有對台灣政府的失望。這個在尼克森宣布訪華前已經發生了，所以這些人要對中國政府抱一點希望了。到了10月台灣退出

聯合國，其實是被逼出去的。

林麗雲 | 在保釣之前已經有些人左傾了，對嗎？

林 | 有一些。保釣前他們已經有政治性的聯繫出現，最有名的是「大風社」——在摩根敦小鎮（Morgantown，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的一座城市）的西弗吉尼亞大學，他們跟《科學月刊》差不多同時開始聯絡。所謂「大風」是來自漢高祖的〈大風歌〉，有一定的政治意涵，也有很大抱負。我的同學就有參與其中的，我也因為辦《科學月刊》管道比較廣，當時就知道了，但他們對外面還是有一定程度的保密性。保釣前左傾的有柏克萊的劉大任和郭松棻的讀書會，張系國也參加過，他們接觸了相當多中國大陸的東西，《毛澤東選集》也讀了。還有中西部威斯康辛大學的麥迪遜分校，是反戰運動中比較基進的地方。因為威斯康辛的移民很多來自於北歐，北歐比較有社會主義傳統。麥迪遜的社會系有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也是分析馬克思主義的重鎮，另一個重鎮是芝加哥大學。那裡有一些香港同學和兩個台灣同學——社會系的王春生和化學系的陳明伊——組了讀書會，保釣風波剛來的時候他們就談論過。我進芝加哥大學時候也碰到幾個左傾的學長，物理系有張子賢和陸光祖（兩人是舅甥關係）。

陳 | 那個時候講左傾的意思是指對中國認識比較多？

林 | 對。我也沒有跟他們談很多，但感覺上這些人有左傾。比如他們的語言是批評國民黨，說國民黨會這樣是因為美國怎樣怎樣。張子賢是很熱情的人，不管你聽不聽，見到你就拼命跟你介紹中國大陸，說毛澤東多偉大。那時我們都不太敢聽，也有人聽他說過毛澤東是「king of philosophy」（哲學之王）。陳明伊本來也要來芝加哥大學，但他的指導教授調到普林斯頓，他也跟著去了，然後又去了麥迪遜。大風社是政治性的社團，但未必是左傾的，其他幾個左傾的都還只是個人而已。東部的有在波士頓的香港人廖約克，以

及保釣開始前就覺
們更有決心、更埋
革命，效法當時的
覺上當時他們有一
應該是到美國後讀
來就成立了「台灣
可以幹革命了。他
的人是黃武雄，也
誰參與可能只有他

陳 | 這在當時並不

林 | 其中只有一兩
《台灣時代》。保釣
住了，他們覺得這
似乎他們內部也有
他們此前讀了一些
繼續吸收一些新血
盟。那之前還不算
七、八組。我並不
都可以成功了，要

陳 | 可能就像是我
個世界革命的環節
關係都在那邊。某

林麗雲 | 保釣前搞

及保釣開始前就嚮往中國的段世堯和陳若曦。此外有一些台灣本省籍的，他們更有決心、更埋名隱姓，每個學校可能有一兩個人。他們想要回到台灣幹革命，效法當時的「南越人民解放陣線」成立了一個「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感覺上當時他們有一點組織，其中一些人後來也回到台灣，但沒有什麼影響。應該是到美國後讀了一些中國大陸的東西，有人想要把他們組織起來。再後來就成立了「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保釣發生後他們大概覺得時機到了，可以幹革命了。他們會組讀書會，據說開會時大家戴面具。這個居中搞串聯的人是黃武雄，也是《台灣人民》的靈魂人物，大概大家都信任他吧，究竟有誰參與可能只有他最清楚。

陳 | 這在當時並不是所謂「海外獨左」？

林 | 其中只有一兩個是獨的，比較重要的是左雄，他後來辦了《台灣革命》和《台灣時代》。保釣應該也對社盟這些人有些影響，同時美國在越戰中也撐不住了，他們覺得這是回台灣的最好時機，可以把美國帝國主義趕出台灣了。似乎他們內部也有一種說法是不回台灣就是背叛革命，其中左雄沒有回來。他們此前讀了一些東西，回台灣之前想要把它們整理出來，希望能夠在海外繼續吸收一些新血。於是辦了《台灣人民》。雜誌出到第二、三期時成立了社盟。那之前還不算是有正式組織，都是用一些代號——有鐮刀組、鋤頭組等七、八組。我並不清楚他們的願景是什麼，他們大概想「南越人民解放陣線」都可以成功了，要效法越南把美帝趕出去吧。

陳 | 可能就像是我們那一群人回來想要革命，可是願景是什麼？那大概是一個世界革命的環節，回來就是要投入到組織，投入到工農大眾去，因為你的關係都在那邊。某種程度上來講，黃武雄這些人還是有發揮一些作用的。

林麗雲 | 保釣前搞左傾讀書會的這些人在保釣運動裡面發揮了什麼作用嗎？

林 | 劉大任、郭松棻發揮了最大作用，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麥迪遜那些人也
很積極，可以說是「中西部的柏克萊」。東部的廖約克、李我焱也是。但社盟
這批人在保釣中的作用比較難講，或者說發揮了很複雜的作用。他們人數不
會超過二、三十個，有一些回台灣後發現這裡並沒有海外想像得那麼成熟，
或者說時機非常不成熟，所以動彈不得。這些人對保釣沒有積極介入。但
《台灣人民》出刊時保釣剛剛左轉，我們讀到後覺得很驚訝，這群不知哪裡冒
出來的人比我們理論水平更高。《台灣人民》對保釣運動往左走有一種刺激作
用，本來我們覺得自己變左是很正統的，怎麼突然來了一個不知哪裡冒出來
的左派——這也可以算是玩笑話了。

陳 | 劉大任跟《台灣人民》這些人有沒有關係？許登源跟這些人的關係呢？

林 | 以我所知來講，郭松棻跟他們有一點關係。《台灣人民》出了兩期後他們
決定全體回台灣，因為他們以留在海外為恥，於是就要找誰可以繼續辦刊物。
他們在保釣運動中觀察合適的人選，因為郭松棻在《戰報》中已經表現一些左
傾，他們就找他來當主編，但他沒有接受。至於許登源，《台灣人民》出來他
非常興奮，但他本來不是他們的人。他本來在台灣是殷海光的弟子，出國前覺
得在哲學上已經讀通了，對哲學上怎麼建立一個認識世界的體系已經了然於
胸了。但是到了柏克萊接觸了大陸的東西，發現有些東西竟然是自己過去的
盲點。他因為念哲學，也對追求真理有很大的真誠，花了很多時間不眠不休
地讀那些書。一段時間後他多年來建立在邏輯實證論上的對世界的看法徹底
崩潰，覺得自己過去的東西是被誤導的、經不起考驗的。本來在念的哲學也不
念了，改拿了一個電腦碩士，然後跑到紐約花旗銀行做電腦工程師。他在
紐約跟一些類似的朋友有些來往，但不是剛才講的那些。他讀到《台灣人民》
後很熱誠地想進去，《台灣人民》在被郭松棻拒絕之後只好接受了他。再說回
來，《台灣人民》的主流是支持和肯定中國革命的，左雄並不是主流。

陳 | 那麼這個系統跟後來的洪哲勝有聯繫嗎？

林 | 沒有。《台灣人民》出刊時，關於要不要回國鬥爭是第十期時，獨的人捐了一些錢，運動蓬勃興起，海資助。他覺得《台灣人民》是《台灣時代》的海外版，《台灣時代》在海外

林麗雲 | 從《台灣人民》

林 | 有，而且《台灣人民》基本上就是這群比，是跟保釣運動的互，因此出現內部矛盾，段的是它與保釣運動，《戰報》為代表的保釣運動，獨，其實是主張台灣身沒有太大差異。較沒有這三方面的，這時候海外跟台灣深刻。它面臨的兩，出來，怎麼分析運動為主流。

保釣運動左轉後

陳 | 運動開始左轉

林 | 沒有。《台灣人民》在歷史中經過三次鬥爭：第一次鬥爭是第二、三期時，關於要不要回台灣，與找接班人的問題；第二次鬥爭是第八期；第三次鬥爭是第十期時，第十期後就停刊了。左雄到第二次鬥爭時就分裂開了，台獨的人捐了一些錢給他辦了《台灣革命》，一共出了四期或五期。台灣黨外運動蓬勃興起，海外台灣同鄉會的台獨也擴大起來，左雄獲得一些這方面的資助。他覺得《台灣革命》的「革命」不利於團結這些人，於是改出《台灣時代》。《台灣時代》跟《台灣革命》基本上一脈相承，但《台灣革命》比較左，《台灣時代》在海外台獨高漲時則比較獨一點。

林麗雲 | 從《台灣人民》到《台灣思潮》，有沒有性質上的轉變？

林 | 有，而且《台灣人民》本身也有一些轉折。第一階段，《台灣人民》的前兩期基本上是這群比較生澀的變左的人的研究報告。第二階段有兩條軸線，一是跟保釣運動的互動，二是跟台獨的互動，這使得它受到的壓力蠻大的，也因此出現內部矛盾。第三階段的衝突以統獨矛盾為主。其實貫穿第二、三階段的是它與保釣運動之間的鬥爭，雙方都想獲得左派的領導權。而且以《群報》為代表的保釣人士認為《台灣人民》包含著台獨的禍心——表面上不談統獨，其實是主張台獨。從今天來看，雙方除了權力的爭議之外，左的內容本身沒有太大差異。與其說是路線之爭，不如說是領導權之爭。《台灣思潮》比較沒有這三方面的關係，它出現時保釣已經過去了，台獨力量已經高漲了。這時候海外跟台灣的关系更密切了，它對台灣的分析和左派的理論都比過去深刻。它面臨的兩個挑戰：一是台灣社會疾速地變化，很多社會力量被釋放出來，怎麼分析蓬勃興起的黨外運動，怎麼掌握大的脈絡；二是海外台獨成為主流。

保釣運動左轉後的個人變動及行動

陳 | 運動開始左轉以後，你自己的狀態是什麼？是同樣在這個轉變當中，或

是與其形成一個對話關係？

林 | 我轉變得很慢，開始看到大家都在念《毛選》時是很不屑的。這跟我自己的態度和念科學的經歷都有關係。我很不喜歡跟風，覺得那是沒有經過自己的政治判斷和認識盲目跟著別人走。我是大概隔了一年多才開始改變。別人的刊物都改名《國是通訊》、《統一通訊》或《中國通訊》了，我們的還是叫《釣魚台快訊》，覺得自己是真誠的保釣。有一次我們在密西根開會，其他保釣人士開了五個小時的車過來，結果發現我們竟然沒有在讀《毛選》很驚訝。雖然我們沒有跟著左轉，跟他們還是從《科學月刊》就開始的老朋友，但是在芝加哥還在做自己的。當時在《釣魚台快訊》的人主要有夏沛然和太太王渝（夏的父親夏濤聲是青年黨的重要人物）、化學系鄒寧遠和太太倪慧如、物理系虞光（他的父親虞兆中做過台大校長）。第二年發生了南越侵占西沙群島事件，我們又發動了「保沙運動」。雖然我們沒有左傾，也都了解國民黨的問題，該批評國民黨的地方還是批評。其他人因為左傾開始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我想中國已經實現社會主義了，可是台灣還在水深火熱之中。真正的左派應該站在被壓迫人民的立場，所以他們應該更關心台灣才對，而不是投靠大陸。

尼克森宣布訪華後，輿論開始關心台灣問題，國際記者也會問到統一的問題。當時認同中國的人當然支持中國的政策要求，跟著認為要統一。這時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對今天的台灣都有很大影響，就是反台獨。海外保釣開始反台獨，但這就把海外很多本省籍台灣人逼成台獨。這些本省籍的人聽父兄講了很多對國民黨不滿的地方，所以會同情台獨，但他們本身並不是支持台獨的。我們對這些狀況應該是同情地了解，而不應該對他們冷嘲熱諷——甚至把他們說成是「帝國主義的走狗」。這樣的結果反而是把很多本來不是台獨的人逼去支持台獨。我辦《科學月刊》時接觸了一些人，覺得很多人並不是按省籍來劃分的，再加上我自己本來對政治不是特別熱衷，所以很不以為然。雖然我小時候也聽過父母抱怨過外省人，比如我爸爸因為他的不得志很容易有這樣的抱怨，但父母總體上很少講，可能也怕我們去外面亂講話吧。

我的意思是，本省籍的人因為不滿國民黨，容易同情台獨。至少他們是為了台灣人民在努力，而且是冒著上黑名單的風險站出來，不應該那樣批評他們。但有些保釣的人變成左派以及轉進統運之後，他們的對手已經不是美國、日本或國民黨了，而是台獨。那時我就預言到這樣只會把更多台灣人逼成台獨，最後果然是這樣。海外台獨力量變得非常大。台灣黨外運動興起後，台獨又影響到黨外運動，直到現在影響著台灣的政治形態。這是我覺得保釣人士起到的作用，很可惜，這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我當時也做了一些努力想要把運動拉回來，但是沒能成功。雖然沒有左派理論的支撐，當時我覺得省籍矛盾不是重要的，可以講台灣的問題是國民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矛盾。我當時這樣的講法是統運的人不能認同的，也激起很多辯論。他們祭出一個理論講統一中國的三個力量：祖國的強大、國際條件的成熟、台灣同胞的覺醒。這三個力量是有次序的，首要是祖國的強大，這樣才可以刺激「台灣同胞的覺醒」。但是正如我所預料的，其結果恰恰適得其反。坦白講，我會繼續釣運跟這個有關係。我幾乎是在釣運圈子裡注意到這個情況的唯一一個。在這個狀況下如果我回到書齋，運動會很快乏弱，我還是想做些努力把牠拉回來。結果越陷越深，還進了黑名單。1971年我就被確認為黑名單，雖然我對政府沒有表過態，但參與到運動的核心分子都是這樣的狀況（除了國民黨自己系統的人），當時進入黑名單的保釣分子我猜想有七、八百人。總之，我要繼續運動有幾個因素：一是保釣還沒有成功；二是我不要跟風轉向左派；三是統獨因素。並且我在保釣裡變成唯一可以做橋樑的人，我想我撤走了的話，連橋樑都沒了。

到了保釣之後的1972或1973年，我們在編《釣魚台快訊》期間跟新同學的談話中遇到了孫中山的問題。我還是一直可以接觸到新來的同學，因為《科學月刊》也會接觸到新的人。在台灣的反共思想中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這些共產主義思想的重要人物都是「匪類」，我想台灣因為反共有這樣的認識可以理解。可是在大陸跟台灣的對峙下，如果大陸像台灣所講的那麼壞，它對待三民主義創始人孫中山應該比台灣對待毛澤東罵得要更凶才對。懷著這個好奇心，我去圖書館查大陸怎麼評價孫中山，結果跟我想像的很有

差距。於是我積極地收集大陸涉及孫中山研究的報紙、期刊和專書，看過之後覺得大陸很多東西我真的不了解。而且他們在評價孫中山時難免會用一些社會主義的觀念或專有名詞，我看得似懂非懂，就想要進一步搞清楚這些觀念是什麼意思。於是那之後花了一、兩年的時間，用這種很奇怪的方式接觸了社會主義思想。

後來我被吊銷護照，運動也沒什麼可搞了，有了很多時間可以讀書。但一開始的時候也不是很願意直接看經典的東西，總覺得經典太被神聖化之後不太容易了解，而且還是一百多年前的東西。我更喜歡看跟當下問題更有關係的，比如關於當下世界局勢的東西，所以一定程度上也就受到了美國社會和大學裡反越戰運動的影響。開始接觸這些後就對美國有了更深的認識，也有了對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批判意識。所以我自己其實改變得很慢，別人看到風聲一來馬上就可以衝到前面去了，我還落在後面。

陳 | 那麼，你是在保釣結束之後那段時間，在夏威夷遇到陳玉璽和你後來的老婆陳美霞的？

林 | 那時候在到處串，尋找同志。如果知道哪個地方有熱誠地支持保釣的人，我就跑過去，所以1975年第一次去了夏威夷。陳玉璽在夏威夷匯集了一個支持保釣的小團體，小團體形成後出了一份刊物《中國之友》，時間大概是1974或1975年——狹義的保釣已經結束之後。這群人主要是學生：陳玉璽、吳義博、王耀南、朱立創。王耀南有一段時間幫葉芸芸做《台灣與世界》的主編，後來回了台灣。朱立創後來以保釣的精神和方法在紐約做社區工作，被人稱是紐約法拉盛的「地下市長」。據說有一次一個女生在路上被欺負，沒人幫忙，他就提議成立一個守望相助巡守隊，至今已經招募到一千五百個志工。《中國之友》重點介紹中國的情況，也就是說這些人比較左傾，其中主要人物是陳玉璽。

保釣之前的1966或1967年左右，陳玉璽到夏威夷大學念政治系，跟導師商量要研究文革，在這裡開始了左翼啟蒙。他到圖書館查文革的資料，國

民黨在那裡的眼線
日本首相佐藤榮作
尼克森宣布訪華大
下的交易——希望
台灣。據說陳玉璽
還要撞牆自殺。可
說後，去中華民國
黨施壓。妥協的結
能判太久，他只能
作。當時《自立晚
師生還是很有情義
大學的師生又開始
國，所以美國一面

他七〇年代中
業論文就是後來人
論應用到台灣。七
時間。聽說《中報
玉璽的原則有些衝
後回到台灣。他最
這些年他信佛教很
去紐約見到他過去
宗教領域，還是保

陳 | 陳玉璽後來在
繫。

林 | 陳玉璽被害判
學。所以最終這個

民黨在那裡的眼線給他打了小報告，他被吊銷護照後只好去了日本。當時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是非常右翼的，他似乎是日本歷史上做最久的首相，直到尼克森宣布訪華才退下來。他跟國民黨的關係非常好，聽說國民黨跟他有私下的交易——希望日本政府協助將一些滯留在日本的黑名單秘密地強制送回台灣。據說陳玉璽因此被日本送回台灣審判，刑求的過程也很痛苦。傳說他還要撞牆自殺，可是景美看守所的牆是撞不死人的。夏威夷大學的師生聽說後，去中華民國駐夏威夷領事館抗議，用輿論攻勢通過美國國務院對國民黨施壓。妥協的結果是夏威夷大學可以派人去旁聽審判。因為有人旁聽就不能判太久，他只被判了七年，最後三年半假釋出來。政治犯出來很難找到工作，當時《自立晚報》的老闆吳三連比較有膽，用他當記者。夏威夷大學的師生還是很有情義地跟他聯絡，他也表示很想到美國完成學業。於是夏威夷大學的師生又開始示威遊行，當時國民黨外交已經越來越困難，很怕得罪美國，所以美國一施壓就放人了。

他七〇年代中期回到夏威夷，辦了《中國之友》，也完成了學業。他的畢業論文就是後來人間出版社幫他出的那一本《台灣的依附型發展》，把依附理論應用到台灣。七〇末至八〇初他畢業後到了紐約《中報》，在那裡待了一段時間。聽說《中報》的老闆傅朝樞有一些不想得罪中共當局等考量，這些跟陳玉璽的原則有些衝突，於是他離開《中報》，去香港浸會大學教了幾年書，最後回到台灣。他最初似乎最先到南華教書，那時我還跟他見過。聽說最近這些年他信佛教很虔誠，可是近五、六年我都沒有跟他聯絡過了。今年寒假去紐約見到他過去的朋友朱立創，朱立創跟他還有聯繫，聽起來他雖然進入宗教領域，還是保留了過去的一些東西。

陳 | 陳玉璽後來在台灣圈子裡起了作用，比如跟陳明忠、蘇慶黎這些人的聯繫。

林 | 陳玉璽被審判時有國際特赦組織關心，並且把這個消息轉告夏威夷大學。所以最終這個案子依國民黨《懲治叛亂條例》來說，算是判得輕的。他出

來後被吸收加入國際特赦組織，對於一些內部消息都有聯通。1976年7月初陳明忠被逮捕，同時我剛好到夏威夷。陳玉璽就私下跟我說台灣有一個政治迫害的案件——陳明忠案，也給我看瞭國際特赦組織從日本傳來的訊息。我們當時有商量一下該如何協助，或許他在那之後有跟《夏潮》聯繫過。

林麗雲 | 所以你在陳明忠事件上的唯一消息管道是陳玉璽？台灣那時主要針對政治犯的人權組織已經開始動了，最初是郭雨新，後來是陳菊、蘇慶黎、陳映真和陳鼓應等人都有參與。陳鼓應是老師，比較可以接觸到外國學生，他的說法是他有通過外國學生帶消息給你和另外兩個人。

林 | 陳玉璽那邊是國際特赦組織的梅心怡從日本把消息給他。我這邊除了陳玉璽和陳鼓應的消息管道，還有威斯康辛麥迪遜的鄭德昌、賴淑卿夫婦。鄭德昌是獨派的，但賴淑卿本來是左派且支持統一，四人幫事件後整個破滅。當時我跟他們也蠻熟的，王津平在麥迪遜時跟賴淑卿在理念上很談得來。陳玉璽在夏威夷跟我講過後，我剛好有機會到麥迪遜去，賴淑卿跟我講了王津平請她將陳明忠事件轉告給我。所以至少有這樣三個管道。

陳 | 陳明忠在訪談中說他出差去日本時，陳玉璽請他把一份台灣政治犯名單轉交給日本的對口人，這一塊看起來是陳玉璽的關係。陳玉璽中間去了《自立晚報》做記者，這也是一個活動的空間，會碰到很多人。

林麗雲 | 另外陳映真在懷念蘇慶黎的文章中寫道，蘇慶黎想要辦一份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刊物時，陳玉璽把陳映真介紹給了她。說明辦《夏潮》之前，她和陳玉璽的關係已經不錯了。陳鼓應也說過，蘇慶黎大學畢業後寫過一篇關於孟加拉的文章，那是台灣很少數對第三世界國家的介紹。經過陳鼓應的介紹，蘇慶黎在《台灣政論》寫一個關於國際觀點的專欄，因為她那時還沒有那個能力，所以是由她跟陳玉璽一起寫的。在今天看來《夏潮》是一個很有思想性和國際視野的刊物，為什麼蘇慶黎一開始就有這麼深厚的基礎？有一個說

法是陳玉璽可能給了

台灣民主運動支

陳 | 你在1979年成立
還是《釣魚台快訊》的

林 | 夏沛然和王滄沒
夫婦留得比較久，但
不太一樣。支援會聯
被吊銷護照後沒有工
關心台灣為主。支援
其中比較顯著的。另
學時，在海外支持鄉
大學辦一些座談會；
論戰那一次，有個人
派來的。他拿出一個
戰的資料。

保釣運動後的19
會議。每年大家聚在
根州立大學、印第安
大學、愛荷華州立大
做了一些事，如辦二
邀請更多人參加。基
支援會成立後也在繼
開或半公開的夏令營
支援會的成立是
字也是他取的。那時

法是陳玉璽可能給了她很多的意見。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時期的活動與串聯

陳 | 你在1979年成立了「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基地還是在芝加哥，參與者還是《釣魚台快訊》的那群人嗎？

林 | 夏沛然和王渝沒有繼續讀書，到聯合國做翻譯，離開了芝加哥。倪慧如夫婦留得比較久，但也陸續離開了。支援會成立時也有一批人，但跟之前的不太一樣。支援會聯絡的歷史蠻複雜的，變動很多，也牽扯到很多東西。我被吊銷護照後沒有工作或收入，有一票保釣人士基本認同我的主張——要以關心台灣為主。支援會成立之前，我們已經做了一些事情，陳明忠事件只是其中比較顯著的。另外比如，帶出其他一些政治犯的消息；台灣圍剿鄉土文學時，在海外支持鄉土文學；台灣原住民運動和環保運動起來時，在芝加哥大學辦一些座談會；每年暑假辦夏令營，分批邀請不同的人過來。鄉土文學論戰那一次，有個人從台灣出來，跟我講了個暗號，我就知道他是我的朋友派來的。他拿出一個「007的皮箱」給我後就走了，裡面有一大堆鄉土文學論戰的資料。

保釣運動後的1972年左右開始，我們有了一個中西部保釣運動團體工作會議。每年大家聚在一起，聚集了十幾個活躍的團體——密西根大學、密西根州立大學、印第安納大學、伊利諾大學、麥迪遜分校、普渡大學、聖路易大學、愛荷華州立大學等。以這些堅持保釣運動或堅持辦刊物的團體為基礎做了一些事，如辦二二八紀念會。這本來是內部工作夥伴的交流，後來決定邀請更多人參加，甚至台灣的——陳明忠、蘇慶黎、莫那能等。這些活動在支援會成立後也在繼續辦，夏令營也是如此，每年會有五、六十個人參與公開或半公開的夏令營。

支援會的成立是因為黃武雄從台灣寫了一封秘密的信給我，支援會的名字也是他取的。那時候我跟台灣已經有了不少聯絡，比如蘇慶黎等人。有一

次有個人拿了一張信封裡面的白紙給我，拿一支筆在上面畫了畫，紙上就顯示出字來。這些人的聯絡都很隱蔽，也有人用公用電話打給我約在很偏僻的地方，談話並交代了資料之後就分手了。總之很多台灣來的人跟我單線聯繫，但是這些人當時都絕對不能透露，因為我們最大的考慮就是不能害到他們。

我大學時就認識黃武雄，他在數學系，我們都住在第六宿舍。我們差一兩屆，但好幾門課都是一起上的。剛開始辦《科學月刊》時，他就會寫信給我，每次都寫很多張。之前並不知道他的經歷，保釣時他已經變左了，我還什麼都不懂。一次我在舊金山的時候，朋友來電話說有個從台灣來的人叫我過去，我跑過去見到了黃武雄。我不知道他找我幹什麼，似乎有什麼重大的事情要跟我合作，但還在考察我。之後碰了幾次面後比較熟了，才會談一些事情，比如他講到他回到台灣支持王拓競選、跟陳菊建立關係等。

1978年年底的選舉中黨外聲勢大振，剛好碰到卡特總統宣布美國跟台灣斷交，台灣進入緊急狀態，中斷了選舉。那一次選舉中可以看出國民黨一定慘敗，國民黨應該會開始設法整治黨外領袖。他們知道余登發是黨外的金主，是橋頭鄉的地主，而且很慷慨。國民黨便借用吳泰安事件拿他開刀，後來假戲真做的吳泰安被槍斃了。之後黃武雄的朋友帶了一封信到美國給我，說台灣局勢很緊張，希望我們在美國聲援。他講得很具體——支援會的名字、操作辦法都想好了。他之所以找上我是因為雖然海外台獨派也在聲援民主運動，但他覺得如果民主人士落到國民黨手裡，這狀況可能對他們更不利。而我長期以來聲援民主運動，而且不統不獨，也沒有去過大陸。我第一次去大陸大概是2001年，但之前一直有謠傳說看到我去過，可是如果我去過就不可能回來美國了。

陳 | 阿肥(丘延亮)等人辦的「台灣研討會」跟你有關嗎？當時蔡仁堅有去發表，我也有跑去參加。

林 | 那是八〇年代中期我們規畫的，設法跟芝加哥大學的遠東中心合作，由阿肥出面來執行。在海外的跟台灣黨外運動有關的人士，我們都會出面接

觸。蔡仁堅就是這
張富忠和林正杰
歲)的書稿很早
方演講。當時邱
來在南伊利諾大
明德是密切合作
萬年國會當作「
是他的意見，由
哥，他後來在吳
著轉到比較便宜
起。邱義仁很快
得留在外面是一種

支援會的人
我覺得自己是黑
他在中原大學時
陳國坤認識阿偉
間，後來還是我
些，阿肥來得稍
芝加哥大學之後
深，做過一段時間
但很多事情會幫

另外因為我
右開始就有幾個
的開銷並不多，
為此去募款。另
們另外一個常合
去。我跟陳映真、

囑，蔡仁堅就是這樣認識的。另一個接觸到的重要人物是邱義仁。邱義仁、張富忠和林正杰曾經在陳菊的邀請下為郭雨新助選。中壢事件後，《選舉萬歲》的書稿很早就送到我這邊來了。張富忠到美國後，我幫他聯絡到很多地方演講。當時邱義仁、吳乃德和賀端蕃三人都在芝加哥大學念書。邱義仁本來在南伊利諾大學念哲學，在台灣時他在黨外運動中參與得很多，並且跟施明德是密切合作的。施明德曾經出了一篇〈增設中央第四國會芻議〉，提議把萬年國會當作「貴族院」，實際上的權力應該放給民選國會。邱義仁說這一篇是他的意見，由他執筆，施明德掛名發表。我到南伊利諾找他，勸他來芝加哥，他後來在吳乃德之後到了芝加哥大學。因為芝加哥大學學費太貴，賀端蕃轉到比較便宜的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但繼續跟邱義仁、吳乃德住在一起。邱義仁很快拿到碩士學位回到台灣，或許是台灣局勢變化太快，讓他覺得留在外面是一種「奢侈」，也或許是芝加哥大學學費太貴了。

支援會的人很多、很雜。雖然支援會是公開的，但有些人不願意露面，我覺得自己是黑名單，也就無所謂了。舒詩偉在1980年左右到芝加哥大學。他在中原大學時候就跟張富忠成了好朋友，也跟陳國坤很熟。我忘了是通過陳國坤認識阿偉，還是反過來。但阿偉跟我關係很密切，他待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來還是我的室友。總之這邊的人進進出出的，陳津渡來的時間稍早一些，阿肥來得稍晚。夏威夷還有一個李義仁，之前跟陳玉璽他們一起。他到芝加哥大學之後跟我住在一起，在支援會參與得比較深。阿偉參與得也比較深，做過一段時間支援會機關刊物《民主台灣》的主編。阿肥沒有正式加入，但很多事情會幫忙。比如郭雨新到美國後，我們會一起開車去找他。

另外因為我進了黑名單沒有收入，剛開始大家會零散幫忙，1975年左右開始就有幾個家庭會按月定期資助我的生活，長達十年之久。支援會本身的開銷並不多，辦活動就是參與的人各自出錢，但張富忠來美國前我有特意為此去募款。另外每年夏令營需要一些錢，尤其是從台灣請人來的開銷。我們另外一個常合作的管道是聶華苓的愛荷華寫作班，她們辦活動時我們會過去。我跟陳映真、王禎和、楊逵都是在那裡第一次見面的。

林麗雲 | 支援會的活動看起來是對黨外圈子內的統獨都有邀請。那麼，在支援會、《台灣與世界》和《台灣思潮》幾個團體之間，統獨構成一個問題嗎？支援會跟台獨聯盟之間的關係呢？

林 | 支援會的人整體來講並沒有那種基本教義派的台獨，主要是關心台灣的弱勢者，探討台灣的左翼力量能不能興起。就兩岸問題而言，沒有堅持統一或獨立，更多還是基於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當然對於台灣長期在反共教育下的狀況，我們也想要做一些努力。支援會剛成立時，遇到余登發事件及其後許信良被免除桃園縣長職務。我們想要搞示威遊行，跟台獨聯盟提議聯合聲援許信良和余登發，他們沒有答應。我們已經表示過合作的意願，但這一次之後就沒有什麼合作了。

葉芸芸剛開始想要找我去編《台灣與世界》，因為那時我正在失業。但我有一些很複雜的考慮，我想要發展跟台灣更多的關係，離開芝加哥到東岸不一定適合，而且編務也會占據很多精力。此外相當影響我決定的一個考慮是，我覺得《台灣與世界》的做法是服務在美國的台灣人，我更想要直接支援台灣內部的運動。它當然也會報導台灣內部的運動，但刊物因為財力的考量在美國發行，一定要顧慮這邊讀者的口味。我想要把自己的事做下去，是覺得自己可以作為保釣認識台灣的橋樑，因為很多保釣人士對台灣並不了解，尤其是對於台獨意識很不理解，而且也一窩蜂地湧向中國。後來還是跟《台灣與世界》有一些合作關係，我們辦活動也會邀請葉芸芸過來。

如前面說過的，《台灣思潮》跟支援會的成立有密切關係，成立前我已經聯繫上蔡建仁了。蔡建仁來美國前在1973年「黨外四人聯合陣線」（王昆和、張俊宏、康義雄、陳怡榮）台北市議員選舉中助選，那一次黨外全軍覆沒，讓他覺得台灣毫無前途。在台灣時他聽說海外保釣運動轟轟烈烈，可是他來的時候保釣運動已經過去了，在紐約打工一年也沒有找到想要找的人。我從朋友那裡聽說了他，1978年左右跑去洛杉磯找到了他，並把他介紹給洛杉磯參加過保釣運動的一批人。另外，黃武雄之前在社盟有一個回了台灣但發現做不了什麼事的夥伴——顏朝明，筆名李義雄，黃武雄要求他來美國跟我配

合。顏朝明之前在讀書會。我們這邊一些年輕人來一起《台灣人民》便知道會成立後一年左右

回到台灣後的行

林麗雲 | 從1979年有沒有因此變化？

林 | 有。解嚴後，一個士林書店，往通識教育接上線。是1997年。1988年後都是由太太在費找到一個合適的聯國是因為非法居留不能說因為要搞運的事是回到《科學》成。其實1996年開很快找到成大的教

支援會本來的運作方式和內容治、社會、文學藝跟台灣的聯繫建立還沒結束。我輩回式上沒有結束。最

合。顏朝明之前在洛杉磯，這一次也回到洛杉磯跟蔡建仁他們結合，辦一些讀書會。我們這邊除了辦夏令營等活動，也會辦讀書會讀經典左派著作，找一些年輕人來一起住三到五天。有幾次我邀請許登源參加，許登源因為編過《台灣人民》便知道顏朝明跟這批人的關係。於是他們很快連在一起，在支援會成立後一年左右創辦了《台灣思潮》。

回到台灣後的行動與對戰後左翼運動的思考

林麗雲 | 從1979年支援會成立至1988年，台灣經歷了解嚴。支援會的角色有沒有因此變化？

林 | 有。解嚴後，我在一些朋友的鼓勵下設法申請回台灣。我也在美國開了一個士林書店，往台灣賣書，賺一點旅費。其中也接觸到更多的人，比如跟通識教育接上線。我1988年第一次可以回台灣，期間往返多次，真正搬回來是1997年。1988年起我就試圖搬回來，但有很多現實因素要考慮。我結婚後都是由太太在養家，我想如果要回台灣的話，總要有一份收入。所以想要找到一個合適的辦法，既能發揮我的作用，也不能長期靠人家養。之前在美國是因為非法居留而無可奈何，但我覺得要為社會做事情前自己要先自立，不能說因為要搞運動就可以讓別人或社會養。我想到第一件回台灣後可以做的事是回到《科學月刊》，我對科學普及還是有些熱誠，但種種因素下沒有去成。其實1996年陳美霞先回到台灣，她在芝加哥大學做助理教授，回到台灣很快找到成大的教職。

支援會本來的工作會議轉型成為公開的夏令營，在新的條件下有了新的運作方式和內容。早期支援會在做保釣這群人對台灣的了解，收集台灣政治、社會、文學藝術的資料，希望我們自己深化對台灣的認識。之後漸漸地跟台灣的聯繫建立起來了。支援會的轉捩點是解嚴，但形式上而言它到現在還沒結束。我搬回來後，支援會在美國基本是停滯或半停滯狀態，雖然形式上沒有結束。最近幾年反倒又有一些作用，因為我在推動「釣魚台教育計

畫」。教育部提供的經費只有計畫所需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他錢還是要靠支援會組織向海外老朋友募款。

陳 | 你回到台灣後做的幾件事情似乎是之前從保釣下來的一路延續。包括人脈上，如去南藝大并迎瑞那邊、與交大孫春合作，以及1999年跟黃武雄去青草湖社大等。2005年跟通識教育界合作創辦《通識在線》雜誌後，2007年去弘光大學的緣分是什麼？

林 | 回到台灣後我想要在教育上做些努力，雖然不算是直接左派的東西。大部分左派的做法是只做跟左派有關的東西，我覺得這樣圈子會很窄。我回台灣後的前兩年還在探索要做什麼，花了很多時間在工運上，對勞權會、鄭村棋的工委會系統、讀書會和示威遊行有一些介入。可能這樣講有些魯莽，探索的結果是我覺得台灣社運圈子太小了，資本主義整體力量那麼龐大，以這個小圈子很難成大事。於是我滋生的想法就是要暫時跳離這個社運圈，發展更多接觸面，雖然還是朝著社運方向的、比較理想主義的。主要做的兩個方向都是教育的——社區大學和通識教育。

或許有點不謙虛，我辦社區大學和通識教育都很快有一些成績。最早辦社大的時候，我應該把全台灣的社區大學都跑過了。一來，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世界都要重視學習，左翼的人也要管這件事。二來，黃武雄最早在台灣提倡社區大學，構想社區大學成為社運界招募新血的地方。而且在那裡教書既可以拿到薪水，又可以宣傳自己的理念。黃武雄給社區大學兼任老師的薪水比一般大學還要高，如果一個禮拜教兩學分、九小時，可以拿到四千六百塊，也就是每小時五百塊。他本來的規畫是想要每小時給一千塊的，希望可以通過這個方式讓這些社運人士得到經濟上的獨立性。另外，社區大學很多參與者都是社運人士，因為他們覺得在街頭喊太久是不夠的，不能永遠喊下去，要深化就要從教育著手。社大創辦的前一年我曾經看到一個報導，關於在嘉義搞社區整體營造的陳錦煌在社造研討會上的談話。他說社造一定要跟社區教育結合，如果不能從人的教育著手，只是把景象搞好、把產業搞上

去、蓋些房子是沒
他社大也有社運

通識教育則
黃武雄曾經做過
要改的是教育的
一是國際觀不足，
界觀。二是歷史觀
化。三是科學素
大學裡通過通識教

台灣1984年
熟，但並不知道這
的重要典範。我自
亂。有些像是寵
育就是什麼都可以
育界。我也寫一些
會茶敘時我一邊
育。通識評鑑已
為弘光大學大概有
向通識教育協會的
職位。於是我終於
聘。2009年左右我
且需要有一個刊物
當時的校長李宗德
是弘光大學在台中
口答應了，雖然只

林麗雲 | 關於台灣
主運動人士在美文

去、蓋些房子是沒有靈魂的東西。所以黃武雄找工委會辦蘆荻社大，很多其他社大也有社運界的經驗。

通識教育則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部分，因為我們覺得台灣教育問題很多。黃武雄曾經做過「四一〇教改」，要改的是制度上、形式上的，但我覺得更需要改的是教育的實質與內涵。台灣目前的教育有以下幾方面是亟待加強的。一是國際觀不足，現在的國際觀只是歐美、日本觀，要擴大視野，有第三世界觀。二是歷史觀不足，台灣近些年因為去中國化的原因，也連帶著去歷史化。三是科學素養不足，我從辦《科學月刊》就意識到這件事。那麼我可以在大學裡通過通識教育的改革來加強這些，這算是間接的進步吧。

台灣1984年開始通識教育，我1988年回來時感覺到大家對它是一股熱，但並不知道通識教育到底是什麼。芝加哥是20世紀美國通識教育改革的重要典範，我自然對它有動力和機會多了解。台灣的通識教育進行得一團亂，有些像是寵物保健、寶石鑑定之類的都被算是通識教育了，似乎通識教育就是什麼都可以教。我在美國賣書給台灣時，一個很大的客戶就是通識教育界。我也寫一些文章到台灣的報紙或研討會，介紹美國的通識教育，研討會茶敘時我一邊賣書也一邊認識了很多。而且台灣政府越來越重視通識教育，通識評鑑已經成為大學評鑑的重要部分。至於2007年去弘光大學是因為弘光大學大概有一些評鑑的壓力，想要充實通識教育的師資陣容。他們徵詢通識教育協會的意見，大家都推薦林孝信，因為我既懂通識教育，又沒有職位。於是我終於脫離了無業遊民的位置，而且被當作正教授、特聘教授來聘。2009年左右我去了世新。之前我認為通識教育發展到現在需要深化，而且需要有一個刊物的論文是跟升等無關的，就創辦了《通識在線》。世新大學當時的校長牟宗燦熱心地提供辦公室給我們，因為刊物的工作都在台北，可是弘光大學在台中，於是一次我問世新校長賴鼎銘可不可以聘我到台北。他一口答應了，雖然只是作為客座教授。《通識在線》從兩年前起由別人接手編了。

林麗雲 | 關於台灣戰後左翼運動的部分。支援會主要的工作除了作為台灣民主運動人士在美交流的平台、保釣人士交流平台和讀書會之外，在吳永毅的

書裡寫到，支援會扮演了八〇年代後留學生跟之前脈絡交會的平台，比如夏林清、夏鑄九、甯應斌這些人。

林 | 支援會主要的工作就是支持台灣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同時我會跑很多地方見各種人，其中很多人是到目前為止沒有被人知道跟我接觸過的，甚至有些是回到台灣後當了官的。這是靠長期的到處串聯把人連在一起的。柏克萊我去了很多趟，開始時認識夏鑄九，他安排我見了很多，比如陳光興。那時候我並沒有要求他們加入支援會，支援會只是個殼子，只不過實際上做的事是上面這些。我當時努力想要盡量跟所有對台灣進步運動有熱誠的人聯絡，聯絡面很廣，包括陳菊這些人。

林麗雲 | 八〇年代那一批留學生有些回到台灣搞運動。你覺得這些人的運動跟保釣之間是有承繼的關係，還是他們開創了自己新的形式？

林 | 總的來說，我覺得他們開創了新的形式，當然還是有一點小關聯。我覺得《島嶼邊緣》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應了西方社會運動的新的傳統。我個人並不那麼熱衷於引進這些東西，我覺得那些東西有蠻重的西方社會和文化的烙印，並不是那麼適合於台灣。東方或第三世界的情形中有一個西方社會運動很少涉及的課題——反帝國主義，19世紀以來的殖民主義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而這樣地引用西方新社會運動、西方馬克思主義，甚至後現代主義，有一點像是把西方的病移植到東方，自己再呻吟一番。他們跟上面保釣等系統連結得很少，左的理論主要是從西方得來的。其實20世紀第三世界左翼歷史是很豐富的寶藏，第三世界的人自己反而很少去注意，這種遺忘也跟中國走資的影響有關。但這些歷史需要被比較公正地、科學地了解。現在還很難，因為這些多少跟文革結合在一起，但中國大陸現在非常反文革，對這方面管得很緊。

陳 | 《島嶼邊緣》跟鄭村棋、夏林清、吳永毅等回來投入社會運動的人不能

畫等號，後者似乎跟保釣運動之間是有延續性的？這個很難講清楚，比如「台社」（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的出現跟保釣有沒有關係呢？雖然我們在知識分析上不一定有關係，但想一想這些人為什麼會跑到台社來，似乎前面的一些點是有關係的——至少是人脈的關係。

林 | 是，夏林清等人不太屬於我剛才講到的部分。但有一些人不是如你所講的這種情況。例如搞媒體的，這些人的左派思想是從西方馬克思主義來的，比較少考慮第三世界的、反帝的立場。因為帝國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母國，或許越戰的高潮中他們會反帝，但平時並沒有。我長期的觀察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大概只有美國的《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比較有第三世界立場，英國的《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和《科學與社會》（*Science and Society*）都還是有相當程度的歐洲中心主義烙印。台灣一些左派主要接觸的是這一批人，懂了一些左派的詞彙或觀念，也好像是「左派」。但總的來講，他們似乎不能站在東方的受壓迫者的立場上。

陳 | 在你跟陳映真的接觸中，你對他的看法是什麼？以及，你怎麼看他跟台灣戰後左翼的關係？

林 | 知道陳映真是因為他坐牢與辦《夏潮》的經驗，之後初次在愛荷華寫作班碰面後有一見如故的感覺。自從我初次回台灣後就開始去找他，賣書期間也跟他的弟弟陳映朝維持著某種合作。那期間陳映真辦了一個讀書會，我回台灣時都會去參加，他們有時安排聚會也會考慮我的時間。我經常過去潮州街，跟他有過多次深入的對話。記得他很多次建議我不要搞那麼多活動了，要多做理論的建設，因為台灣非常需要理論的工作。但我認為理論的建設需要實踐的基礎，我在台灣的實踐還太少。我覺得陳映真當然是連結台灣戰後左翼老一代和《夏潮》的關鍵人物。他和「老同學」^{iv}有相當程度的接觸，也透

iv 編註：指白色恐怖時期的受害人。

過《夏潮》和《人間》雜誌一直跟年輕人保持聯繫。另外，他的文學也對戰後左翼運動發揮了影響。從六〇年代中期到勞動黨成立之間，他的左翼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勞動黨成立後他反而為了要把黨務弄好、解決糾紛，對外的開展變得弱了，這也是我擔心的地方。

陳 | 那麼工黨成立時，雖然你不在，也會知道一些狀況吧。陳明忠在自傳中也提到，他曾經期待工黨的成立可以成為台灣的第三大勢力，可是中間出了很多問題。對於這一過程，你有什麼看法？

林 | 基於對其他國家的左翼政黨和勞工運動的了解，在海外聽說要成立工黨時，坦白講我是有點懷疑的。台灣工黨成立的條件成熟了嗎？台灣剛剛經過長期戒嚴，包括勞工運動在內的左翼運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時工黨是以《夏潮》系統為一方、王義雄為另一方，以及羅美文等工人力量的三方結合。總之我們在海外覺得有點倉促，我回台灣時工黨就分裂了。工黨成立那一年我們的夏令營邀請了工黨相關人物——羅美文、王義雄，但辦夏令營的時候工黨已經分裂了，只有羅美文出來。羅美文來參加夏令營時，我們這些海外保釣人士向他表達了覺得工黨在大好形勢下分裂非常不應該，雖然我們還是會支持勞動黨，但是希望勞動黨可以汲取教訓，好好地經營。這算是相當委婉地提出批評，然而這個批評也沒有用，勞動黨始終成長不起來。當然我一開始就不認為台灣已經有左翼政黨成長的背景了。我的一個或許有點狂妄的批評是，台灣的左翼太急切，沒有耐心地打基礎。在台灣的選舉文化下很容易躍躍欲試，就會被人家牽著走，不能掌握自己發展的方向。其實現在左翼的大家士氣已經不高了，似乎也不適宜再這麼嚴厲地批評了……

回到台灣後我接觸比較多的是勞動黨系統和工委會系統，可是連這兩個都不能整合，大家力量分散能做什麼呢？台灣的工運和社運界內山頭很多，這在早期是難以避免的。但要起到真正歷史性的作用，這些山頭之間求同存異是必須的——用左派的語言講就是一定要訂出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最低綱領就是大家有這個就可以相互合作了，可是在台灣這些問題都沒有被充分

討論。總的來講，台
之後，我也跟很多相
不足以跟人家玩這
翼力量並沒有什麼成
也看不到新的黨會從
去，尤其是如果2016
小黨。國民黨中很多
在國民黨得不到選票
黨一黨獨大，第二是
可能導致民進黨分裂
崛起。

陳 | 老林，非常感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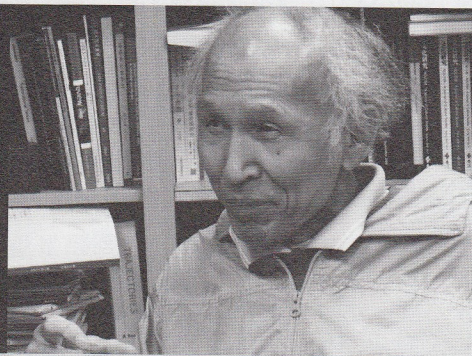
林孝信簡歷

1944	生於台
1950	就讀宜
1956	考入宜
1959	考入建
1962	保送建
1963	「自製」

討論。總的來講，台灣成立左翼政黨有點操之過急，到現在亦然。回到台灣之後，我也跟很多相關朋友講現在還不是往前擠的時候，因為左翼的力量還不足以跟人家玩這個。我這樣的看法在台灣應該算少數，但經過這些之後左翼力量並沒有什麼成長。左翼政黨越來越困難，很少人還對勞動黨抱期望，也看不到新的黨會從哪裡冒出來。有人提出太陽花學運之後國民黨會衰弱下去，尤其是如果2016年選舉再敗得很厲害，可能會逐漸變成一個無足輕重的小黨。國民黨中很多選出來的民意代表等都是很投機的政客。如果他們看到在國民黨得不到選票，一定會跳出去。國民黨萎縮的可能結果，第一是民進黨一黨獨大，第二是新的政黨出現。新政黨的出現會制衡民進黨，這種制衡可能導致民進黨分裂成更獨的與更溫和的政黨，如此一來也可能導致新政黨崛起。

陳 | 老林，非常感謝你接受我們漫長的訪問。

林孝信簡歷



- 1944 生於台北，六歲左右定居宜蘭。
- 1950 就讀宜蘭中山國小。
- 1956 考入宜蘭中學。
- 1959 考入建中。
- 1962 保送進入台大化學，大二轉物理系。
- 1963 「自覺運動」爆發，高中好友劉容生辦《新希望》。

典範在夙昔

側寫林孝信

第一次聽到林孝

已啟，各路好漢躍躍

中，我聽到友人說：

以幫忙。」那時節，

的把這件事記下，還

那時的林孝信被

選人、《科學月刊》創

政府列為黑名單，無

台是愛國行為，怎麼

釣外，還有他和黃武

育。社區大學和通識

人買書」的林孝信，

幾人算幾人。

當然，沒有日後

白，像林孝信這樣的

們，冒著身家性命的

台灣以及台灣以外的

較為理想的彼岸。我

第一次採訪林孝

外，依稀記得好像在

- 1964 創辦台大物理系系刊《時空》。
- 1965 創辦《中學生科學週刊》(刊載於《新生報》)。
- 1966 台灣大學物理系畢業，入伍做預官。
- 1967.10 就讀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研究所。
- 1968 秋 通過博士資格考，後開始籌辦《科學月刊》。
- 1969 出版簡報第一期《工作通報》。
- 1970.1 《科學月刊》在台北創刊。
- 1970 秋 發生釣魚台事件。
- 1970.12 普林斯頓大學台灣留學生率先組成「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後林孝信辦《芝加哥釣魚台快訊》。
- 1971.1.29-30 參與美國第一次保釣示威遊行。
- 1971.4.10 參與華盛頓大遊行，爾後包括林孝信在內的保釣留學生開始閱讀中國近代史和左派理論。
- 1971.9 參與安娜堡國是會議，發生路線分裂。
- 1971.10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 1971 因參加保釣運動，被國民政府吊銷護照，非法居留美國至1984。
- 1976.12 參與救援白色恐怖政治犯陳明忠。
- 1979 成立「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出版機關刊物《民主台灣》，每年舉辦夏令營和座談會。
- 1984.7 與陳美霞結婚，後開辦士林書苑。
- 1988 解嚴後，申請恢復國籍，首次返台，距離離家已二十一年。
- 1997 全家回台，在各地兼課，包括南藝大紀錄片所、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 1999 出任青草湖社大校長，成立「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籌辦年度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
- 2005 創辦《通識在線》。
- 2007-2010 任弘光科技大學特聘教授。
- 2009-2015 任世新大學通識中心客座教授。
- 2012.9.23 擔任「人人保釣大聯盟」召集人發起示威遊行，後成立「釣魚台研習營」。
- 2012至今 主持「釣魚台公民教育專案計畫」。
- 2015.12.20 於台南市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過世，享壽七十一歲。